

《尚书》记言对先秦诸子散文的文学影响

于文哲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山西临汾 041004)

摘要: 作为先秦说理散文成就的体现,诸子散文在很大程度上从哲学、历史、宗教著作中脱离出来,具有了鲜明的文学特征。而其成就的取得,除了得益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特殊政治、文化环境外,也与前代的文学影响密不可分。如果没有《尚书》记言文的成熟,也就不可能出现诸子散文的繁荣局面。从论点和论证结构的鲜明严谨、论据和论证手法的生动形象、对话与人物形象的塑造、感叹词的使用与人物个性色彩的表现四个方面,具体揭示《尚书》散文对诸子散文的文学影响,说明诸子散文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其所以能够开创一个散文辉煌时代,是与对《尚书》散文的学习借鉴分不开的。

关键词: 尚书; 诸子散文; 文学影响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971(2011)04-0117-06

自春秋末年开,“诸子散文”开始出现在先秦文苑中。所谓的“诸子散文”,是指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儒、道、墨、法数家为代表的诸多学术流派的代表性著作。在三百余年中,诸子散文经历了从纯语录体阶段的《论语》、《老子》,到对话论辩体阶段的《孟子》、《庄子》,再到专题论文体阶段的《荀子》、《韩非子》的发展演进。这些以阐述学术思想为主的说理文章,虽不以能文为本,却包含了许多文学因素和语言表达技巧,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尤其是语言的丰富精粹、生动形象,说理论辩具有各自独特的风格、强烈的情感性特征,修辞手法的普遍运用等等,使诸子散文在很大程度上从哲学、历史、宗教著作中脱离出来,具有了鲜明的文学性质,代表了先秦说理散文发展的高度成就。而这些成就的取得,除了得益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特殊政治、文化环境外,也与前代的文学影响密不可分。如果没有《尚书》记言文的成熟,也就不可能出现诸子散文的繁荣局面。《尚书》的记言,首先表现为政治性的言论,是一种具有政论性质的说理文。诸子散文的说理论辩,就是在《尚书》政论说理文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春秋之前,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尚书》这类政治、历史文献由官府的史官执掌。春秋之后,私家之学兴盛,以“百家争鸣”为特征的诸子学术代替了传统的史官学

术而兴起。尽管诸子的学术观念、理论主张各不相同,但在学习借鉴前代思想文化资源方面都表现出同样的积极态度。刘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了著名的“诸子皆出王官说”,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一个事实:诸子的学术性说理论说文决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学习借鉴前代散文,特别是以《尚书》为代表的政论散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诸子散文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其所以能够开创一个新的散文辉煌时代,是与《尚书》散文的积极影响分不开的。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具体分析《尚书》记言对诸子散文的文学影响。

一、以意名篇 据题抒情

《尚书》诰命诸篇的说理,一般都能够做到论点集中、鲜明,能够确立一个中心论点,并围绕这个中心论点组织论证,做到脉络清晰,结构严谨,把道理阐发清楚。如《大诰》一篇,是在周公出师讨伐“三监”之叛前的一篇战前动员演说,全文以“予得吉卜,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为中心,把矛头集中指向发动叛乱的殷人,调动邦君庶士和出征将士的敌忾之气,并利用文王所擅长的占卜之法鼓舞斗志。全文立论驳论

收稿日期: 2011-04-20

作者简介: 于文哲(1967-),男,辽宁沈阳人,编辑,文学博士,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相结合,论点的表达简洁明确,义正词严;论述过程层次清楚,逻辑清晰,结构严谨。尤其是比喻手法的使用,更增加了论证的形象性,使道理的阐发更为具体、生动,更具说服力。《酒诰》则堪称是一篇“禁酒论”。殷末酗酒之风盛行,是殷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年少的康叔受封于殷人故地,周公为了避免他重蹈殷人覆辙,严令康叔于封地实行禁酒。全文以酗酒亡国、禁酒兴国为中心论点,援引了殷周两代的历史,具体说明酗酒、禁酒与国家政治的密切关系。在说明了实行禁酒的意义之后,又具体提出了禁酒的具体方法,结构谨严,说理明晰。《召诰》一篇论点更为集中而鲜明,其主题句“王其疾敬德”以不同形式重复了四次。全文围绕着“敬德”的主题展开论述,首尾连贯,脉络清晰,正如王国维所说“《康诰》以下九篇,周之经纶天下之道胥在焉。其书皆以民为言,《召诰》一篇言之尤为反复详尽,曰命曰天曰民曰德,四者一以贯之。”^[1]《无逸》一篇的说理艺术更超乎《召诰》之上。该篇不但论点单一、集中、明确,还特别注意到了中心论点的位置,作者有意识地把中心论点安排在最醒目、最显豁的开头位置。《无逸》开头第一句“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开宗明义,直揭主题,以富于感情色彩的感叹句提出论点,不但引起读者、听众的注意,而且具有情感效果,能够打动读者和听众的心灵。在揭示了主题之后,全文顺势而下,引证古代正反两方面丰富的经验教训,反复陈说,最后自然得出“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的结论。形式上,虽每段开头冠以“周公曰”,似为不相连属的语录,实则内在逻辑严谨而清晰,去掉“周公曰”,结构仍完整顺畅,堪称是《尚书》诰命篇章中最具说理艺术力量的作品。

相对于《尚书》诰命的说理而言,诸子说理散文在当时百家争鸣激烈论辩风气的影响下,具有更为自觉的论辩意识和更为成熟的说理技巧,不但说理文章的篇幅更丰长,结构也更为复杂多变,在说理论辩艺术上取得了更高的成就。《论语》是早期诸子说理散文的代表,虽然全书的主要内容属于说理性质,但就体制来说,却更近于对话体、语录体,与《尚书》诰命文的体制不同。《孟子》一书在结构上更加完整,篇幅更长,尤其是其开辟抑扬、纵横捭阖的雄辩使该书几乎成为

一部辩论集。但与《论语》一样,说理论辩仍属对话体,尚未形成专题式的文章论证,具有由对话、语录向专题论文过渡的性质。到了《墨子》、《荀子》的出现,诸子的说理论辩文才真正成熟起来。这种成熟首先就表现为论点的集中、鲜明和结构的完整、严谨。《荀子》三十二篇,大多是说理文,其体式已超越了语录和对话的形式,发展为专题议论文。程千帆先生评价《荀子》说:“据题抒论,题即文之中心思想,文亦中心思想的充分发挥,于是篇之观念乃成。”^[2]《荀子》以意名篇,用概括性的标题点明主题,使中心论点集中明确,如《劝学》论学习,《修身》论道德修养,《富国》论经济,《议兵》论军事等等,并据题抒论,层层展开,论证严密。为使中心论点突出醒目,往往在文章的开头直接提出论点,如《劝学》一篇,旨在劝勉学习,起始句“君子曰:学不可以已”,开宗明义,直接点明主题。全篇的论证都紧紧围绕这个主题句进行,层次清楚,逻辑严密。实际上,“以意名篇”“据题抒论”等方法皆起源于《尚书》。《尚书》中《无逸》一篇即以“君子所其无逸”为主题,既是“以意名篇”,复又“据题抒论”;而《酒诰》一篇实开“论体”的先河,堪称专题说理散文之祖。《荀子》而外,《墨子》一书亦重“辩”,以逻辑推理的严密而著称。《墨子》的说理篇章,往往在文章的开头,以“子墨子言曰”的形式,直接提出中心论点,并围绕这一论点展开论证,这与《尚书》诰命诸篇以“周公曰”“王若曰”的形式直接提出全文论点的方式异常接近。与此相同,《韩非子》的说理艺术也具有以意名篇、主题鲜明的特色。不同的是,《韩非子》的说理文往往把中心论点安排在文章的中间而非开头。如《五蠹》一篇,在列举大量历史材料进行论证之后,才提出了中心论点:“圣人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既自然而然地从论述中引申出结论,又为下文的开拓提供了依据,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全文论述首尾连贯一体,过渡巧妙,颇富艺术匠心。

二、据史立论,善用比喻

《尚书》诰命篇章说理的一个重要特色,就

是喜好引证历史作为论据。这些篇章往往以古证今,旁征博引,借历史事实说明事理。具体地看,《尚书》的征引又可分为“引用”和“稽古”两种方式。引用是援引古人及权威的言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尚书》中引用的对象非常广泛,包括古代圣贤的名言,前代诰命中的名句,广泛流传、被社会普遍接受的谣谚,等等。如《酒诰》所引的“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梓材》的“引养引恬”、《多士》的“上帝引逸”等格言,《盘庚》以“迟任有言”、《酒诰》、《秦誓》以“古人有言”引起的前贤名言,都是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富有深刻哲理的格言警句,表现了以民为本的进步思想意识。这些政治性的引语增加了话语的权威性,增强了说理论证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稽古则是援引古人的事迹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包括了正反两个方面,既有可供后世学习借鉴的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事迹和史实,也包括了反面的作为经验教训的史实,二者都具有现实意义,都可以作为现实政治的有益借鉴,可以为论证说理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支持。《尚书》中最常见的征引对象是夏、商二代列王和周民族的先祖,这些人物和他们的事迹都被作为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大量使用。如《无逸》一篇中,周公征引了殷中宗、高宗、祖甲和周太王、王季、文王的正面史实,以及纣王等反面史实,为“无逸”的主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论证支持。《酒诰》一篇,周公总结了成汤以来历史上政治与酒的关系,从正反两方面说明禁酒的重要性。除引证丰富的历史事实作为论据外,《尚书》还经常以比喻作为论据。用比喻作为论据说明问题,可以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鲜明可感,通俗易懂,增强了说理论证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尚书》二十八篇共出现比喻24例,其中有21例出于《商书》和《周书》的诰命文。如《盘庚》一篇,盘庚为了说服臣民们赞同他迁都的计划,于迁都前后作的三次训话中,运用了一系列的比喻帮助进行形象化的说理。这些以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如树木、火、网、耕田、乘舟、射箭等作为喻体的比喻,都能紧密配合中心议题阐明观点。除《盘庚》外,《大诰》和《梓材》更使用了数喻连缀的博喻。《尚书》诰命的比喻可概括为三个主题:生产劳动、日常生活和自然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主题都与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都来自日常生活的基本要

素和家喻户晓的事物,所使用的语言也极为通俗,富于民间生活气息。如《大诰》的“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梓材》的“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陈修,为厥疆畷。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朴斫,惟其涂丹雘”都是(有)数喻连缀的博喻。前者把政治措施的连续性比作父子合作的建筑和耕种,后者把政策的执行比喻为耕种、建房和制作器具,既有比喻的鲜明形象,又具排比的文气壮盛的辞锋,将论证说理与文学审美结合起来。

诸子散文普遍继承了《尚书》据史立论、善用比喻的特色。如早期的《论语》,虽未形成篇章式的论说,但在论证方法上,引证、对比、譬喻等论证方法都有使用。相对而言,据史立论、善用比喻的特色在论辩体的《孟子》中有更为明显的表现。《孟子》以论辩气势雄健著称,而这种雄健的气势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对史实的掌握,以及据史立论、古今对比所形成的强大的说服力。表现在具体的论辩过程中,就是“言必称尧舜”和大量引用《诗》《书》文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史实以及《诗》《书》等儒家经典成为《孟子》论辩取之不竭的理论资源。据统计,《孟子》一书共引用《尚书》文句38次,《诗经》文句40次。古今对比、正反史实对比、引经引言增加了论辩的思想性,而论辩中比喻的使用更使理论问题生动有趣,富于形象性和情感性。善用比喻是《孟子》散文的一大特色。据统计,《孟子》一书共使用了160多个比喻。其中著名的如“鱼我所欲也”、“五十步笑百步”、“缘木求鱼”、“弈秋诲弈”、“邻人攘鸡”、“揠苗助长”等等,都取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既通俗浅近、准确贴切,又寓意深刻、发人深省,增加了论辩的说服力。《孟子》中的一些比喻更进一步发展为具有故事性的寓言。相对于简短的比喻,寓言的文学性更强,如“齐人有一妻一妾者”,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已有小说的风味。《孟子》的寓言艺术发展到《庄子》,更成为一种具有独立意义的艺术形式。在“寓言十九”的《庄子》中,寓言已经从简单的说理取譬,发展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说理故事,甚至取代了逻辑思辨,成为形象化的说理方式。其中的《逍遥游》、《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等篇,几乎全以寓言结构而

成。《尚书》据史立论论证方式的影响,在《墨子》中表现最为明显。《墨子》论证长于归纳,而作为归纳材料的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多。在论证方法上,《墨子》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其中“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的观点,明确地把古代的文献和历史史实作为说理论证的最重要的根据。《墨子》的论辩文章就是“三表法”的具体实践,其中连篇累牍地引证《诗》《书》文献和上古历史,把据史立论的论证方式发展至极致。运用比喻进行论证在《墨子》中也有表现。如《非攻》一篇,以有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攘人犬豕鸡豚”、“入人栏厩,取人牛马”、“杀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剑”四个比喻作为论据进行推理论证,由小及大,由浅入深,层层深入,最后自然推出“非攻”的结论,构思精巧,丝丝入扣,堪称比喻论证的名篇。《荀子》也特别注重“譬称以喻之”的比喻论证方法。《荀子》比喻的最大特点是连类引发,以博喻的形式论证说理。如《劝学》一篇,使用比喻多达40余个,几乎句句用比,只在段落的关键处,才略作议论,点明题旨。

三、人物对话,生动传神

作为最早的记言散文集,《尚书》以记载人物的嘉言懿行为主,其中有许多篇章,都能通过人物对话展现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感情,表现人物生动的个性特征,同时表现出深刻的哲理和思想内涵。如《尧典》中尧和舜的形象、《皋陶谟》中禹和皋陶的形象、《西伯戡黎》中祖伊和纣王的形象、《微子》中微子和父师的形象、《洛诰》中周公和成王的形象,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这种个性特征正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对话塑造出来的。如《尧典》和《皋陶谟》两篇,在人物对话中大量使用感叹词,惟妙惟肖地描摹了人物的语气,生动地表现了对话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等复杂的情感和心理状态,语气逼真,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尧的公正无私、经验丰富、知人善任,舜的谦虚谨慎、从善如流,大禹和皋陶的忠诚耿直、勤勉奉公等等,都通过对话表现出来。其他的以人物对话为主的篇章如《西伯戡黎》,全文以祖伊与商纣王的对话为中心内容。对话中,纣

王的愚蠢、狂妄、固执、死不悔改的个性,祖伊的忠心为国的老臣形象都鲜明地表现出来。文中祖伊的语言凄凉而悲壮,与纣王的骄傲固执形成鲜明对比。《微子》一篇则以殷王子微子启与父师、少师的对话组织全文。文中微子语气的沉痛与无奈、对未来的困惑与彷徨,父师的干练、冷静和对现实的清醒认识,都通过人物的对话,清楚地传达给读者。尤其是周公之诰,如《洛诰》,人物对话简明生动,较多使用虚词,能够描摹出对话人物的语气、神态,使文章染上了较强的感情色彩。在对话中,周公的语气诚恳、庄重,对成王谆谆教诲,叮咛嘱咐;成王则谦逊严谨,较多使用敬辞,表现出对周公的尊重和信任。尤其是对说话人口语的描摹,更具有特殊的修辞效果。如《洛诰》、《无逸》中周公的两次语句反复“孺子其朋,孺子其朋”、“生则逸,生则逸”,如实地描摹周公的语气,将周公忠厚笃诚的个性和强烈的忧患意识表现出来。再如《顾命》一篇,极为细腻生动地再现了弥留之际的成王强撑病体向群臣托孤时的情景。因为成王的托孤之言事关国家大政,故史官如实照录,不敢作任何更改,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成王语言的原貌。其中“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一段话中“肄肄”连言,表现了垂危病人气息微弱、语言断续不接的口语特征,具有真实生动的现场感。

通过对话塑造人物性格的方法也常见于先秦诸子散文。如《论语》,其最大的文学成就反映在语言艺术方面,尤其是在通过人物对话塑造人物性格方面。与《尚书》一样,《论语》也重在记言而略于记事,能够通过人物对话展现人物性格。如《论语》的《先进》篇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能够通过人物的对话,传达出人物各自不同的思想感情,勾勒出人物不同的风神面貌。再如《阳货》篇“子之武城,闻弦歌之音”一段,《述而》篇“子谓颜渊”一段,表现孔子与弟子的对话,风趣幽默,口吻毕肖,人物性格生动逼真,跃然纸上。尤其是在孔子的形象塑造上,更得力于对话方法的使用。《论语》不同于孔子的传记,没有关于孔子具体事迹的详细记载,但读者仍能从中了解到孔子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论语》中所录孔子的对话,大都情趣盎然,耐人寻味,言近旨远,词约义丰,散发着哲

理的光辉,以简洁的语言传神写照,将孔子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正如《文心雕龙·征圣》所说“夫子风采,溢于格言”。与《论语》一样,《孟子》的文体也以对话和语录为主。《论语》中的独白式语录占全书总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对话不到三分之一,而《孟子》的对话内容大为增加,开始由语录体短文向对话体论辩文过渡。与《论语》比较,《孟子》的人物对话,词句更加明快,感情色彩更为强烈,人物个性更为鲜明。《孟子》发展了《尚书》开始的描摹说话人口语特征的传统,具有刻画人物个性、描摹神态语气的修辞效果。如《万章上》中的“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一段,记述子产与校人的对话。其中将子产的“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一句话重复了两次,使子产的大智若愚、校人的善于说谎且自鸣得意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生动地刻画出两人不同的性格特征。顾炎武《日知录·文章繁简》对此评价说“此必须重迭而情事乃尽,此《孟子》文章之妙。”其他如《墨子》散文、《庄子》散文等,都继承了《尚书》开创的这种通过对话塑造人物的方法。

四、感情跌宕,富有情韵

《尚书》中的诰命篇章,主要以训诫性的内容为主,承载着重要的现实政治使命,传达着商周最高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和政治决策。尤其是在事关重大的问题上,这类训诫往往发展为围绕一个特定主题进行的政治演说。这些演说虽然讲究逻辑性,具有说理和政论的性质,但却并不枯燥乏味,而是以直抒胸臆、慷慨陈词为特征,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和鲜明的个性流露,表现出演讲者个人的风神个性,流露出或淡泊或浓郁的感情色彩,其中个别篇章甚至可称为强烈的抒情性作品。如《尚书》中的《盘庚》,便是盘庚个人的“敷心腹肾肠”的讲话记录。其中既有激切的责难,也有温和的劝诫和慰抚,语气多变,感情跌宕起伏。正如杨公骥先生的评论《盘庚》作为最早的记言体语录文,“有着文学的形象性,有着盘庚的自我表现:通过盘庚的思想、情感、语言,表现了一个具有远大眼光和开辟精神的有毅力有智谋的古代国王。”^[3]《尚书》中的说理政论

文普遍表现出鲜明的感情色彩,而且由于时代和环境的不同,这种感情色彩也有变化和差别。鲁迅对此评论说“虞夏禅让,独饶治绩,敷扬休烈,故深大矣;周多征伐,上下相戒,事危而言切,则峻肃而不阿借;惟《尚书》时有哀激之音,若缘崖而失其援,以为夷旷,所未详也。”^[4]较多使用感叹词是《尚书》诰命的一大特点,据统计,《周书》诰命篇章共出现感叹词52次,其中感情色彩强烈的“呜呼”一词出现频率最高,达37次,体现了《尚书》记言篇章的抒情特色。《尚书》诰命篇章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周公诸诰,这些诰命篇章都具有感情色彩和形象性,塑造了周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政治家的风范。尤其是《康诰》、《无逸》等篇,寄寓了周公强烈的感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周公的历史忧患意识和对国家的责任感,文情并茂,寄意深远,一唱三叹,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周书》的最后一篇《秦誓》则更近似于一篇富于抒情性的散文诗。全文以排比对偶句式组织成篇,以四字句为主,虽较少用韵,却具有诗的节奏和风韵,文风舒缓委曲,感情低回沉重。如“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堪称内涵丰富、意境优美的抒情诗句,生动传神地将秦穆公追悔莫及的心情表现出来。这些具有哲理性的认识以近乎抒情诗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议论文字富有感情色彩和抒情性,遂成为其后古代议论文的普遍审美追求。

诸子散文也普遍具有较强烈的感情特点。虽然诸子散文主要以哲理和政论性的议论说理文为主,但其说理议论绝无枯燥乏味之感,而是较多使用感叹词、语助词,较多使用设问句式,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在这方面,《论语》就以说理议论的生动形象、富有感情色彩而博得了后世无数读者的喜爱。其中的语言,往往言简意赅,含蓄深刻,具有诗一般的抒情效果。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以奔流的河水诉说时光流逝、人生易老、事业艰难等深沉的人生感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一段话,以诗一般的语言表达出孔门的政治理想。唐人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曾称赞韩愈的散文兼有“周情孔思”。所谓“周情”指的就是《尚书》周公之诰以情动人的特色;所谓“孔思”指的就是《论语》中记录的孔子言论所表现出的诗化和抒情色彩。《论语》中孔子的语言善于把抽象的哲理凝聚于具体的形象之中,使理论文字富有盎然的诗意,具有浓郁的感情色彩和个性特征。诸子之中,《孟子》的散文一向以言辞犀利,激昂慷慨,具有壮盛雄肆的气势和高度的主体精神而著称。孟子本人的个性特征,他的声容笑貌,鲜活地表现在其论辩篇章中。如《滕文公上》中“陈相见孟子”一段,孟子的论辩,声色俱厉,锋芒毕露,其对于自己坚守的儒家学说的自信态度溢于言表。与《孟子》一样,《庄子》散文也是庄子本人性格情感的真实流露。闻一多先生认为,除了思想家的身份外,庄子还具备一个文学家和诗人的身份。他评价庄子说“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惆怅,圣睿的憧憬,无边无际的企慕,无涯际的艳羨,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

人。”^[5]这段话表明闻一多在《庄子》中体悟到了其中蕴涵的诗歌的情韵,体悟到了《庄子》哲学说理中寄寓着的人类的普遍心理与情感。《庄子》散文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深邃的思想与浓郁的情感融注在一起,近于哲理性的抒情散文诗。《韩非子》散文亦表现出强烈的情感特色和雄健的风格气势,其文风具有犀利恣肆,冷峻严苛,波澜壮阔的特色。尤其是由作者个人身世遭遇所形成的满腔怨愤之情,常常通过说理论辩中激越沉痛的笔调宣泄而出,形成了打动后世读者心灵的强大情感力量。

参考文献:

- [1] 王国维. 观堂集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476.
- [2] 程千帆. 先唐文学源流论略[J]. 武汉师范学院学报, 1981 (4).
- [3] 杨公骥. 中国文学[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57: 136.
- [4] 鲁迅. 汉文学史纲要[G]//鲁迅全集: 第9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351.
- [5] 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 卷二[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 281.

The Literary Influence of Shang Shu's Speech Record upon Pre - Qin ZhuZi Prose

YU Wen-zhe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 Shanxi Linfen 041004 , China)

Abstract: As the major achievement of pre - Qin reasoning prose , ZheZi prose developed from the books of philosophy , history and religion and began to contain literary elements. This achievement benefited mainly from the predecessor's literary influence besides the special political cultural environments of Spring - Autumn and war - country times. Without the maturity of ShangShu's speech record , it's impossible for the prosperous situation of pre - Qin ZhuZi prose to appear. From the four aspects such as rigorous argument and distinctive argument structure , vividly demonstrated practices and reasoning techniques , dialogue and shaping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use of exclamation and the colorful personalities , this paper reveals the Shang-Shu's literary influence upon ZhiZi prose and explains th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of ZhuZi prose which created a glorious era of prose , because of being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nfluence of ShangShu's speech record.

Key words: ShangShu; ZheZi prose; literary influence

[责任编辑 郑红翠]